



学而

戏中七夕

□ 梁文俊

《长生殿》是戏曲创作大家洪升的代表作，讲的是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照整个情节讲，似乎和“七夕”没多大关系。就因为这位风流皇帝和宠妃杨玉环七月七日之夜在长生殿上对天盟誓，愿生生世世结为夫妻，是有感于天上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故事。剧名叫做《长生殿》，正是取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中“七月七日长生殿”句。在《长生殿》里，牛郎织女成为唐明皇和杨贵妃爱情的保护神，戏曲将牛女传说与李杨爱情巧妙融合，足见剧作家杰出的艺术匠心。

《明代杂剧全目》中有《渡天河织女会牛郎》《鹊桥记》等，可惜有的剧本未传下来。写牛女故事比较好的戏曲是明末才女梁孟昭创作的《相思砚》，作品借家喻户晓的牛女故事作为引子，以“相”“思”两砚做爱情的枢纽，让他俩在人间实现团圆的夙愿，颇富浪漫色彩。

清代是牛女故事戏曲化的辉煌时期。据说舞台上常演的《天河配》就编演于清末民初。《天河配》写的是商人张有才兄弟同居，张妻嘎氏挑唆分家，其弟牛郎只分得老牛一头。哪知此牛乃金牛星下界，他教牛郎去天河窃取天孙织女的衣服。牛郎遂与织女相遇、相知、相爱，后二人成婚，男耕女织，生下一双儿女。数年之后，王母召织女回天界，牛郎携子女追赶，却为天河所阻。王母允许他们每年七夕相会，届时，百鸟搭成鹊桥，二人渡河相会。剧情发展大喜大悲，曲折动人，是一出优秀的神话戏。

1921年，京剧大师梅兰芳曾在吉祥茶园演过《天河配》。剧中设计了摆七巧图、莲池出浴、鹊桥相会等布景，在最后一场，从鹊桥下还飞出成百只鸟雀，一时传为美谈。

《天河配》不仅有京剧，还有黄梅戏、越剧、评戏、豫剧、秦腔、河北梆子等诸多剧种。无论何剧种的此剧，大都在七夕前后上演，几乎场场爆满，成为非常叫座的节令戏。如果翻开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报纸，每逢七夕前后，在戏曲广告中不难发现“戏班争演《天河配》”和“满城争看《天河配》”的盛况。

一些地方戏在《天河配》演出中，还融进了当地文化元素。如：有的在欢庆牛郎织女成亲拜堂一场中，加上杂耍表演，在摆七巧灯中，众多仙童执莲花灯依次摆出“天下太平”字样；有的在剧情中加上牛郎的哥哥遭受火灾到牛郎处借贷求助，嫂嫂悔过认错，牛郎和织女慷慨相助的情节，颇具人情味；还有的以“真牛上台”出演，黄牛是从农村临时借来，在特角上装饰一条彩绸由牛郎牵着上场，但有的耕牛对舞台的环境毫无适应能力，有时发起牛脾气竟赖在台上不动，无奈之下只好由牛的主人和检场人匆匆上场帮助，连推带拉地带后台，观众笑得前仰后合，但从不喝倒彩，因为人们认为看戏就是来“找乐”。

掌故

杨慎与遥岑楼有缘，他在遥岑楼设馆讲学授徒。非常喜欢这座楼阁，杨有诗为证，《游法华寺晚归再饮遥岑楼》：“罗绮伴仙游，云林意转幽。草愁金履齿，花妒锦缠头。阳焰红将敛，晴岚翠欲流。清樽兴不尽，邀月坐岑楼。”“红将敛”“翠欲流”，当为暮春（或夏初）季节，此时草木茂盛，百花争艳，诗人结伴游赏，心情愉快，傍晚回到遥岑楼，游兴未尽，举杯邀月，人生宠辱，一概置之度外，遥岑楼给了他无限宽慰。在遥岑楼，杨慎感受此情此景，流露出个人的孤苦：“遥岑楼上俯晴川，万里登临绝塞边。碣石东浮三峰色，秀峰西合点苍烟。天涯学子悬双泪，海畔孤臣谪九年。虚拟短衣随李广，汉家无事勒燕然。”

遥岑楼位于安宁县城官衙街北头螳螂川边，为一座翘檐六角的古典式建筑，高17米，周围30米，顶端呈荷叶状。最初为嘉靖初年安宁知州王白庵所建，是王白庵得知杨慎被谪戍云南的消息后特意为他来此讲学和游赏作准备的。“遥岑”作为楼名，别具韵味。遥者，远也，飘泊也。《礼·王制》：“自江至衡山，千里而遥。”岑者，小而高也。岑楼，尖顶高楼，高锐似山。王白庵建造这样一座楼阁，取“遥岑”为名，意蕴深远。真可谓独具匠心。

据《安宁州志》载：“遥岑楼在州东关

遥岑楼

火，时隐时现，映入眼帘，不觉心旷神怡，诗兴勃发。他不仅给安宁温泉冠以“天下第一汤”的美称，还亲笔挥毫，题写“不可不饮”四字，镌于温泉崖壁，安宁温泉声名远扬。

杨慎对安宁的文物古建筑同样情有独钟，他所撰写的《重修曹溪寺记》是曹溪寺内碑碣中保存最好的一块。记述了曹溪寺的由来、兴衰过程和寺内外的风景名胜。杨慎说：“连然金方，螳螂宝地，蔚何名蓝？实曰曹溪，衍六祖之云席，分一勺之法流，邈乎远矣。”

这位状元对曹溪寺风光景物描绘得格外优美，激情高昂，活灵活现，如在绘画中：“林木翳荟，人境顿隔，旁列洞穴，石宇窈窕。蝉栖影息，时翔岁集。松籁鸟韵，旦衍鱼山之音；风柯月渚，夕湛龙湖之境……”安宁山川景物在杨慎心灵脑海中留下深深的印迹：“高峣亦吾庐，安宁亦吾宅，屏居三十年，宛如故乡陌。”垂暮之年，仍依依不舍，眷恋之情油然而生：其从《留别安宁、滇城诸友》诗云：“垂老东还日，天涯此别稀。关山归马地，江水钓鱼矶。秉烛情何尽，衔杯泪欲挥。相思辛相问，处处有鸿飞。”从年头的“正月滇南春色早”到年末的“屠苏已识春风面”再到“天气常如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描绘了四季如春的景象。

书话

“力避俗见”解东坡

——读张炜《斑斓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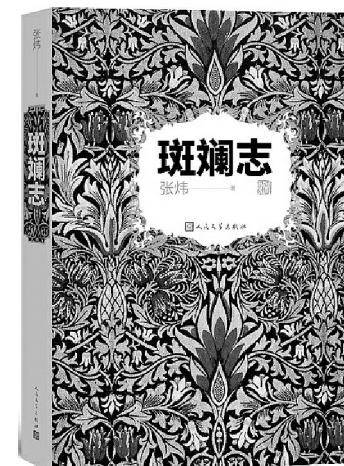
□ 张光茫

苏轼是北宋的文坛宗师。他文韬武略兼备，从政40余年，政绩卓然。一生虽历尽坎坷，却乐观旷达，追求美好，还是位千古留名的美食家。继《楚辞笔记》《读诗经》《陶渊明的遗产》《也说李白与杜甫》等作品后，当代著名作家张炜又推出其解读苏轼的作品《斑斓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8月第1版）。书中，张炜用独到的才华，“力避俗见”解东坡。

写苏东坡的书，实在太多，角度各不同。《斑斓志》既不是传记写法，也不走学术之路，而是以专题讲座的形式，由苏东坡颠簸流离的一生提炼出七个主题词，每个主题词之下是若干生命细节的观照。从“不自觉的强势”“真伪自由书”“一生刑赏”到“从娇客到弃石”“煎耗养颓”“直击沦落客”“异人三视”，最后再到“不可套语解东坡”“走不出的迷宫”，近一百三十个标题，每题都紧扣独思，拨动心弦。书中将心比心的诚恳、过人的知性，读后时而激越时而屏息，既痛快淋漓又耳目一新。

张炜借苏轼之口，解读了世道人心。在“醉与醒”话题下，张炜总结道：“如果一个人的醉，有时是沉溺于庸俗的友谊，满足于私情和廉价的情感，那么这一定是危险的，实际上是另一种麻木和沉沦。一朝从厄运中惊醒，会发现那些可耻的背叛者，原来竟是平时的亲近密友……诗人写道，‘人伪相加有余怨，天真丧尽无纯诚。徒自取先用极力，谁知所得皆空名。’这是醒者才能说出的话，当我们记取。”很难讲这是张炜从苏轼那里领悟到的，还是在以苏轼印证自己对世道人心的感悟。

书中凝结着借古讽今的意识。在话题“汉语的深处”下，张炜解读了苏轼写给友人李常（黄庭坚舅父）的《李氏山房藏书记》，在苏轼的时代，雕版印刷普及，书籍供应大增，书籍从难得的奢侈品变为易得的平常之物，苏轼感叹“后生科举



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张炜联系到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数字化阅读，批判道“他们借助于数字搜索技术，认为一切皆唾手可得，由此以来又何止是游谈无根，而直接就是轻浮的过客，是空心人，诗与思、真理与谬误，所有的一切都与我们了无干系，冷漠变为常态，我们成为知识和思想的势利之徒：用则寻，不用则弃，它与我们的情感，更不用说心灵，真的不再有深刻的联系。”

张炜多次提到乌台诗案，认为正是这炼狱之火成就了诗人，“这一场文字狱、一场旷世冤案之后，这位天才人物的心灵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就在这里，他攀上了诗与思的最高处，那是穷尽一生才能达到的高度。”张炜论说诗人的政治立场，“苏东坡并不是那种轻易就范于成说的人，他既能坚执，同时又是一个博采广纳的人。他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改革派，而是一个求真派和务实派。”但是，苏东坡即便在最痛苦的时候，在着力反省和自我追究的时候，“也没有达到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类人物的状态，没有那样震撼人心的追问和探求，特别是强大的

罪感”。此处之中外类比过于牵强，有点苛求古人了。

张炜对苏东坡和王安石二人的比较，就远比大多数人要客观。绝大多数人总是将两人推到两个极端，既然是政敌似乎就必须水火不容忠奸分明，所以大凡写苏东坡的文章或书籍都对王安石过于诋毁。张炜就公正得多，能够承认“他们兩人都是北宋王朝的能吏与文豪”。其实王安石当时最大的两个政敌苏东坡和司马光，对其个人的评价都挺高，他们都是君子，政见国策之争一步不让，这是公事，但这种争吵不会延伸到私仇，反而是后世没有他们那样的君子人格，以庸常之人的心理去度量君子的心理。

张炜站在一个相对客观的位置，冷静而深入地解读已经概念化的苏东坡，这里面有对误解的反驳。比如《世间恩怨》一讲中，对前期全力反对新法到后期部分肯定新法一事，有人视苏东坡为出尔反尔的投机主义者，张炜直指此说“荒谬”，于苏东坡恰恰“充分表现了理性和求真的力量”。更多的，则是对苏东坡一些坊间定论的再阐发。在《迷宫》一讲中，对于苏东坡“乐天派”的形象，张炜指出，“其实这些文字有一大部分是正话反说。对于他而言，这不过是一种自我引导，是强调和鼓励，以求得解脱。”对于“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的豪言，张炜认为“这是人生的大言，大言可以不惭，也只有苏东坡可以做得到”，不必当真。

书名为“斑斓志”，苏东坡一生确实斑斓多彩，然其内心一直是儒家学说的忠实实践者，其才情掩盖不住，随时随地都能洒碎一片金光。中国文人的人格理想，一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二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以说，正是这两种可亲可敬的文化人格，让苏东坡更久远地赢得了后人的心灵共鸣。